

理念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首要根本任务奠定哲学基础。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需要在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把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内在要求把促进公平正义作为当今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核心理念。公平正义既因注重机会公平、起点公平和规则公平而能带来社会活力,也因注重分配公平而能促进社会和谐。这正是当今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追求的。

再次是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变。主要包括:1. 由感性思维走向理性思维,注重理性思维的力量。由于“时空压缩”,我国一直处于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进程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市场和资本力量的驱动,使得一些人注重尽快致富赚钱。“追赶”、“尽快”滋生了一些人的急躁、躁动、浮躁等功利主义、非理性主义倾向。这种功利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注重感性、感觉和表象。当今中国,注重创新驱动、分配正义、国家治理和社会秩序,实现“新三步走战略”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升和掌握话语权,都要求我们必须具有透过现象把握本质、由经验思维走向理论思维、由感性直观走向科学分析的理性思维;2. 由碎片化思维走向战略辩证法。感性思维相对注重当下、眼前、局部,注重片面、孤立、静止地看问题,因而它往往抓住的是事物的表象和碎片,忽视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和长远发展。这实际上是一种碎片化思维。在当今中国发展进程中,无论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还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无论是实现“新三步走战略”,还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都要求我们确立战略辩证法,既运用战略思维进行整体思考、谋划和设计,又运用辩证思维化解矛盾和处理问题;3. 由“主客思维”走向“主体间性思维”。1978年初期,我们强调实践和社会生产力,在各项工作中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哲学上主要体现为“主客思维”。这种思维走向极端,就往往会把自

我当作主体、标准和尺度,易导致极端个人主义。注重分配正义、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建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新秩序,内在要求我们在哲学上树立“主体间性思维”。这种思维注重平等意识和协商民主;4. 由模糊思维走向边界思维。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中,经济、政治、社会等各领域是混合在一起的,没有分离和分开,也没有明确的边界。由此在哲学上往往形成的是模糊思维,凡事多显模糊而缺乏精确、精准。随着社会结构转型、领域分离和力量转移,内在要求在哲学上形成边界思维,即要在各个领域之间划清边界,且明确各个领域的本质和功能。

第四是哲学新形态的建构。即建构基于公平正义的结构主义哲学。这种结构主义基于公平正义理念,或者是具有公平正义本质和性质的结构主义,它自然注重和谐和共赢,注重主体间性思维;这种结构主义注重结构转型、领域分离和力量转移,进而注重辩证对待和处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辩证对待和处理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平衡机制和治理机制的协调、配合,因而它注重研究边界问题;这种结构主义注重理性设计和战略思维,因而注重通过合理地调整结构以建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新秩序。要言之,它既蕴含着理性主义和共赢主义,又蕴含着战略辩证法。

最后是哲学新目标的确立。即这种基于公平正义的结构主义之时间目标,就是建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新秩序。具体展开来说,就是它相对注重“立”:既使我们党自身硬,又使中国成为强国,也要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现代化的制度模式(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还要基于公平正义理念,确立好合理的权力分配制度和利益分配制度,充分发挥好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平衡机制和治理机制的作用,使政府力量、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形成合力,最终形成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好局面。

中国转型的逻辑

段培君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近年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新常态”等相关论述表明,当代中国发展已进入新的转型阶段。为此,笔者在《中国结构性

大战略》一书中提出转型的大战略框架,包括“双引擎”经济战略、“十字型”政治战略和“双向开放”的社会与文化战略、“三位一体”的宏观调控等。^① 这

^①段培君:《中国结构性大战略》,上海远东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

些已程度不同地在近年中国的战略实践中体现出来,其中“双引擎”已成为中国政府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的正式表达。^① 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当代中国转型的内在逻辑进行简要分析,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动力逻辑、历史逻辑、系统逻辑、操作逻辑、协调逻辑和价值逻辑。

一、中国转型的动力逻辑:结构性矛盾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矛盾,不仅体现在经济结构上,而且体现在政治、社会、文化、资源环境结构上,体现为整体性的结构问题。结构性矛盾影响了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是中国转型的内在动因。

经济结构的矛盾集中体现在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上。在需求结构方面,投资、消费和出口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出现了结构倾斜:投资率过高且投资偏重于高消耗产业。2014年,中国消费率仅为51.2%,比改革开放初期1983年的67.4%低16.2个百分点,比2000年的63.7%低12.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投资率仍然高达46.1%,比1983年的31.7%高14.4个百分点,比2000年的33.9%高出12.2个百分点。这一结构性矛盾派生了以下矛盾:第一,以产能过剩为标志的供需矛盾。如2014年钢9亿吨产能,过剩2亿吨;水泥、平板玻璃等也都出现产能过剩。第二,以通货膨胀为标志的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的矛盾。1949—2011年共贷款55万亿元,而2008—2011年则占了半壁江山(28万亿元);广义货币M2在2011年85.16万亿,到2014年升至122.84万亿。第三,以成本上升为标志的经济扩张与经济效益下降的矛盾。2011年农民工月工资1991元,2012年上升为2249元。越南工人工资是中国工人的1/2。成本差距带来的企业外迁将导致投资驱动力的下降。第四,以资源瓶颈和污染为标志的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矛盾。高耗能行业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从2012年开始逐年下降,但到2014年仍有28.4%。据第三次经济普查之后修订的数据,2013年六大高耗能行业的能源消费占规模以上工业能耗的比重达79.8%,规模以上工业能耗占全部工业能耗的比重为94.2%,全部工业能耗占全社会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为69.8%。因此,全社会能源消费总量的一半以上是高耗能行业消费的。

在供给结构方面,创新驱动动力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比重低、增长缓慢。高技术产业占我国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从2011年开始逐年上升,但到2014年也只有10.6%。传统粗放式发

展模式不仅使经济发展的后续动力不足,而且隐含危机的可能。增加知识和技术要素的供给,转向创新驱动,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已是势在必行。

经济结构的倾斜,其深层次的原因与权力结构相关。权力结构倾斜导致的收入分配结构的倾斜,使得国家财富中的较大份额不断作为新的资本投入传统行业和金融领域,而不能用于民众消费能力的增长、生活水平的改善、新兴产业的发展。在这一意义上,转变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以有利于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的优化调整,是实现中国转型的关键。与此同时,经济结构、权力结构的倾斜也是产生社会问题的深刻根源。因土地问题引发的群众上访和群体性事件,是这种结构性倾斜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典型反映。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的结构性矛盾是中国转型的现实动力。

二、中国转型的历史逻辑:全球结构性变迁

研究中国转型需要着眼于更长远的历史视野。在这一视野中,一方面,实践的人在活动中改变现实,体现出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这一活动又受制于具体的物质条件,体现为某种客观规律性。马克思的自然史视野对于认识中国的转型有着特殊重要性。^②

波特在论述产业发展时基于这一视野指出了上升阶梯中的三个阶段:第一是资源驱动,第二是投资驱动,第三是创新驱动。这三个阶段或三种模式大体描述了产业发展的某种历史逻辑。研究全球现代化进程中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发展模式当然比研究产业的发展模式要复杂得多,但我们仍然可以确认一些基本的结构性变迁的趋势。这些趋势笔者在《中国结构性大战略》中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 创新为导向的经济结构变迁。经济发展的内涵不仅意味着经济规模的增长,更意味着经济结构的优化,而创新是结构优化的关键。熊彼特认为,创新是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创新就是经济发展。创新催生了新的产业结构,改变了全球经济的发展方式和产业布局。“在这一意义上,笔者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一定阶段的要求,也是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趋势。需要在当代经济发展规律的意义上把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机制。”^③

2. 经济社会综合结构的发展趋势。随着创新的全球辐射和产业结构的全球变化,经济本身也走向全球化、整体化。创新需要研发机构、企业、政府机

^①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冬季达沃斯致辞和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

^②马克思:“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见《资本论》第一版序言,载于《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第10页。

^③段培君:《权宜之计不能脱离基本战略取向》载于《沪港经济》,2009年第7期。

构与中介组织等形成国家创新体系,形成新的社会结构。信息网络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存交往方式,改变了全球经济运行方式和社会治理模式,正在向大数据的层面跃迁。在此过程中,社会组织爆炸式发展,形成了“全球结社革命”。上述方面的相互作用推动综合性、整体性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形成。

3. 代际关系结构的战略性变化。当代与后代的协调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人类正在努力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方式,实现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面对全球发展的新趋势和中国的结构性矛盾,粗放式的发展模式为新的发展模式所取代已成必然。

三、中国转型的系统逻辑:结构性大战略

提出结构性大战略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经济结构问题,而要解决经济结构问题,就必须同时解决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大结构问题。换一个角度讲,经济战略、政治战略、社会战略与文化战略等也必须形成结构性的关系。这个意思是说,要解决的问题是大结构,解决问题的战略之间也要形成结构,这是所谓结构性大战略的简单含义。所以,结构性大战略的立意就是致力于中国的转型。

从战略学的学理上看,本文提出结构性大战略,与战略学界所说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实际上是相通的,可以视为大战略的某种运用。1929年哈特初步论述了大战略的概念。从当代的情形看,大战略的“大”,第一是战略选择手段范围的“大”,包括政治、经济、心理、军事、科技等手段;第二是战略目标范围的“大”,其目标考量不仅包括传统的安全目标,而且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发展目标,而且后者在一般情况下是国家的首要目标;第三,是战略系统的“大”,即把大手段与大目标协调起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安全等方面的战略联为一体,形成综合性、整体性的大战略。所以,大战略的大目标、大手段、大协调涉及大战略的大系统视野,要求全面把握大战略中各种手段、路径、资源之间的关系,全面把握大战略中各种目标之间的关系,全面把握各种手段与目标之间的关系,全面把握效果与代价之间的关系。

结构性大战略属于大战略的一种类型。它不仅涉及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而且基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结构的内在相关性,强调整体结构的优化调整。它要强调的思想是,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是战略重点,但这一优化调整必须置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整体结构的优化调整中才能实现,因为就其实质来说,经济结构的问题恰恰与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的问题深刻地联系在一起。而且,就新的发展阶段而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整体结构的优

化调整本身就是这一大战略的目标。

所以,结构性大战略作为经济发展的手段,需要全面协调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诸要素以使得经济能够持续增长;同时,作为目标设计,它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作为国家目标。它包括结构性经济战略、结构性政治战略、结构性社会战略与结构性宏观调控等内容,是以广义的结构调整与优化为发展的主要目标与路径的战略,无疑是大系统的视野。

四、中国转型的操作逻辑:“双引擎”、“十字型”和“双向开放”

将结构性大战略向操作层面延伸,形成具体的实施战略——“双引擎”经济战略,“十字型”政治战略和“双向开放”的社会与文化战略。

“双引擎”经济战略指通过调整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而发挥两个动力引擎的作用,使之形成互补效应。需求引擎是通过需求结构的调整,将以投资为首要推动的发展模式转变为以消费为首位的,消费、投资、出口三者具有比较合理结构的发展模式。供给引擎是通过要素结构的调整,实施创新战略,使经济发展向创新驱动型转变,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双引擎战略是以调整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为重点,结合其他结构的调整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双引擎中的创新驱动是面向未来的核心战略。“双引擎”战略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的正式表达。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冬季达沃斯致辞和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明确了这一点。李克强总理说:“当前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减弱,必须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改造传统引擎,打造新引擎。”“我们要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推动发展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实现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十字型”政治战略是要解决经济结构调整中深层次的体制性问题。“十字型”战略是基于需求和供给结构调整而进行的纵向和横向权力结构的调整。纵向方面,进一步改革人财物的管理体制,减少政府对财权、物权、人力资源的控制,扩大民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从而降低投资率,扩大消费率,通过放权保证经济发展的需求动力;横向方面,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使专业化、社会化进程与权力分置结合起来,形成企业、事业单位和政府相互独立而又功能互补的格局,进而在国家决策层面上建立起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机制。通过横向分权,推动创新主体解放,建立国家创新体系,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双向开放”的社会与文化战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内开放,即社会财富、公共资源与公共服务的开放与均衡化,使社会财富、公共资源在开放中进一

步地流动起来,使得内需得以扩大,需求结构得以改善,效率进一步提高,社会公平、公正程度得以改善;二是对外开放,拓展和优化开放结构,完善内外联动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强调技术、经济、制度、思想文化层面都面临更加开放的任务,以实现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升级。开放的社会和文化战略不仅是对结构性经济和政治战略的有力支撑,其本身也是社会和文化领域的战略目标。

经济战略、政治战略、社会和文化战略,各有不同的内涵和举措,但三者又彼此配套、彼此呼应,共同致力于结构性大战略的目标。“双引擎”战略(结构性经济战略)与“十字型”战略(结构性政治战略)、双向开放战略(结构性社会与文化战略),以及结构性宏观调控,是中国结构性大战略的具体展开。

五、中国转型的协调逻辑:战略与机制的“三位一体”

协调逻辑集中体现于战略与机制以及机制和机制之间。笔者于2006年提出的“三位一体”的宏观调控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在外部关系中宏观调控、结构性战略与市场机制的“三位一体”关系;二是在内部关系中,结构性的调控目标配以结构性调控手段——结构性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就业政策。这一概念将宏观调控置于“三位一体”的结构中,强调短期宏观调控必须服从于长期战略的要求,必须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

协调逻辑具有以下三种含义:第一,结合逻辑。宏观调控的短期政策效应与长期战略的结合,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的结合;第二,服从逻辑。宏观调控对总量的调控以及其他措施,不仅需要考虑经济增长和运行的稳定,而且需要着眼于解决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从根本上服务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时,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须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第三,渗透逻辑。结构性大战略的思想渗透于宏观调控中。宏观调控应瞄准结构性优化,其手段应具有结构性,如结构性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就业政策,对不同的调控领域给予不同的调控力度,使调控结果出现结构性特征。

把握上述协调逻辑具有现实意义。其一,有利于把握好战略导向。单纯进行宏观调控并不能实现转变发展模式的目标。其二,有利于着重解决体制机制问题。经济、政治、社会的结构性调整难点在体制机制,因此着力点应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市场机制决定作用的发挥和其他体制机制的完善。其三,有利于科学实施宏观调控,在应急调控时更加重视战略导向。如4万亿投资,应将结构优化调整作为基本目标。4万亿“蛋糕”看似当时的救急方案,实际关乎中国的发展走向,关系能否走出原有的发展模

式而避免重大危机,关系能否抓住历史性的转折机遇实现长期持续稳定发展。

协调逻辑也试图解决市场和调控两种机制的关系:“中国的经济增长离不开市场机制和调控机制的结合”,“如果试图取得创新的成功,必须处理这两种组织和两种机制的结合关系。”这是两点论。同时,要强调市场机制的重点论:“只有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结构调整才能有效进行,也就是说,强调了市场机制是结构性大战略取得成效的一个前提”。具体地看,“要推进双引擎战略,解决投资与消费失衡和需求结构的调整问题,必须解决产权的落实机制问题”,“要推进双引擎战略,解决供给方面的创新能力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问题,必须解决垄断和价格机制的改革问题”。^①

六、中国转型的价值逻辑:“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作为中国转型的价值逻辑,突出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人的价值需求的全面性和价值实践进程的全面化趋势。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的“必须更加自觉地把以人为本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不断在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取得新成效”,是这一趋势的政策表达。中国转型所展现的价值实践进程的全面化趋势,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正是基于这一价值逻辑,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必须更加自觉地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近期关于“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体现了这种全面化趋势的新内涵。其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反映了“以人为本”价值的建制化趋势。

其次是中国转型中主体性的新要求。价值目标的实现无疑依赖于人的主体性的发挥和主体地位的确立。改革的根本目标往往是通过确立生产经营者的主体地位而实现的。不论是以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的农民的主体地位,还是城市改革确立的企业主体地位,抑或今天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向,都需要这种主体性的历史推进。可以说,“以人为本”是

^①段培君:《中国结构性大战略》上海远东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

对这种主体性的确认。这种主体性意义在当代有其特殊内涵。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和全球创新的推进,人本身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越来越成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和力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推动力。在此意义下,当代经济社会发展规律需要通过“以人为本”进行新的阐述。中国之所以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中国发展战略的核心,正是出于对这种发展规律的认识。进一步地看,“双引

擎”战略所强调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正是揭示了人的主体性的历史新逻辑。

综上,我们已经意识到,中国转型中的动力逻辑、历史逻辑、系统逻辑、操作逻辑、协调逻辑和价值逻辑是中国转型逻辑不同方面的体现,彼此间具有深刻的联系。这种联系需要专文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面向中国整体转型升级的价值哲学研究

朱 辉 宇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价值哲学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进步紧密相扣。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伟大历史转折,就没有价值哲学对原有禁锢的突破,也就没有此后长足而深入的发展。当前,中国社会正经历着整体转型和升级,党领导人民进行着“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①。价值哲学应立足生活世界及其结构性变革,面向现实的价值问题,推进自身的理论创新,实现自身的理论价值。

一、面向中国整体转型升级的客观现实

哲学批判和创新不能囿于哲学自身的理论驳诘,而应跳脱出单纯的学理视阈,立足哲学理论赖以产生的生活世界。当前,在经济社会迈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国开始了整体转型升级的历史进程,这形成了诸多理论研究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时空“场域”^②。我们的价值哲学研究正是在这一场域中展开,其理论叙述也是在这一背景中出场的。若此,当前的价值哲学研究必须立基于中国整体转型升级的客观现实,并在转型升级的现实逻辑中拓展价值哲学的理论研究。

明确了面向中国整体转型升级的现实向度之后,关键的问题就转换为价值哲学应该面向何种客观现实,或者说在价值哲学视野中,需要把握的客观现实究竟是什么?鉴于哲学思辨的内在本性与规律,我们认为,哲学面向和把握的现实是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及其展开,是繁杂现象背后的“本质性”及其展示,是感性背后的“理性”及其展现。当前,

价值哲学意义上的客观现实是中国整体转型升级进程中价值现象之后的价值发展规律及其特性。价值哲学研究不能满足于价值现象的简单罗列和描述,应深入考察和把握中国整体转型升级进程中具有(空间)普遍性、(时间)长期性、(性质)根本性及中国性的价值问题与规律。换言之,面向中国整体转型升级的价值哲学,应聚焦影响转型升级、社会变革和国家进步的普遍性价值问题;应重点分析新常态下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乃至影响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决定性价值问题;应着力考察与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话语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联系的富于中国性的价值问题。

首先,如何在运用资本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限定资本逻辑对人们生活的侵蚀。众所周知,“资本是人类能够找到的借以创造价值和享用价值的方式,作为一种流动的货币,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设置,资本乃是悖论式的存在,在给人类带来极大财富,从根本上拓展了人们的交往领域和生活空间的同时,又造成了诸多价值问题”^③。当前,伴随着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形成,我国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领域都出现了新的问题和挑战。为了引领中国在新常态下保持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执政党带领人民进行了主动改革,在总体上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整体转型升级。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继续发挥资本的作用,调动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类市场要素的经济发展功能,但同时必须警惕资本逻辑在价值领域的扩张,防止极端物质主义、后果主义、效用主义等价值观念及其行为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2年出版,第12页。

②[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

③晏辉:《直面问题自身:反思、批判、预设的中国价值哲学》载于《桂海论丛》2015年第3期。

阅读此文的还阅读了:

- [1. 中国经济:转型的逻辑](#)
- [2. 从逻辑角度思考中国经济必须转型](#)
- [3. 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转型逻辑](#)
- [4. 中国经济转型的政治逻辑——国家中心主义的分析框架](#)
- [5. 新媒体环境下中国报业转型逻辑](#)
- [6. 中国金融转型的逻辑与难点](#)
- [7. 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转型逻辑](#)
- [8. 中国经济转型的实践模式与内在逻辑](#)
- [9. 中国转型模式的含义和逻辑](#)
- [10. 中国模式的转型逻辑与理论创新](#)
- [11. 中国转型秩序及其制度逻辑](#)
- [12. 当前中国产业政策转型的基本逻辑](#)
- [13. 转型逻辑与政治空间——转型视角下的中国政府信任危机析因](#)
- [14. 经济逻辑与经济转型——中国经济转型为什么这么难?](#)
- [15. 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转型逻辑](#)
- [16.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合理逻辑及对策](#)
- [17. 中国股票市场的政府控制:转型经济的逻辑](#)
- [18. 中国金融转型的逻辑与难点](#)
- [19. 中国媒介产业转型的三个逻辑点](#)
- [20. 国家构建与政党转型:中国政治发展的行动逻辑](#)
- [21. 中国金融转型的逻辑与难点](#)
- [22. 财政收敛是中国经济转型逻辑起点](#)
- [23. 中国社会转型期传媒发展的逻辑与使命](#)
- [24. 论中国特色反腐模式转型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路径](#)

- [32. 中国模式的转型逻辑与理论创新](#)
- [33. 当前中国产业政策转型的基本逻辑](#)
- [34. 中国社会治理的转型及其三大逻辑](#)
- [35. 中国模式的转型逻辑及制度框架](#)
- [36. 风险刑法的理论逻辑——兼及转型中国的路径选择](#)
- [37. 中国媒介产业转型的三个逻辑点](#)
- [38. 城市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逻辑](#)
- [39. 中国转型的逻辑](#)
- [40. 中国转型秩序及其制度逻辑（英文）](#)
- [41. 中国转型秩序及其制度逻辑](#)
- [42. 略论中国近现代政治转型的现实逻辑](#)
- [43. 论当代中国政治转型的逻辑与轨迹](#)
- [44. 环保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逻辑起点](#)
- [45. 转型期中国干群矛盾的演变逻辑](#)
- [46. 2018,中国经济调整转型的逻辑](#)
- [47. 中国地方财政体制演变的逻辑与转型](#)
- [48.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经验逻辑](#)
- [49. 转型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特征与发展逻辑](#)
- [50. 中国社会转型动力群体的行为逻辑与当代特征](#)